



书评理念与实践 下

伍 杰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书评理念与实践 下

陈 燕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G256.4

2

:2

2006

书评理念与实践 下

伍 杰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下

册

第三编

书香盈野

自成一家的《书评学》

书评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艺书评尤为发达,众多的诗话便是有力的说明。但是书评理论很薄弱,书评缺乏理论指导,所评之书不广泛,不系统,散论居多,随意性很大。书评无人说它是一门专门学问,可以说书评在人们眼里尚不成学。近些年来,书评事业有很大发展,书评理论的探索在蓬勃兴起,相继有许多书评理论读物问世。这些著作把书评学大大推进了一步。在诸多学问中,书评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受到社会的关注、承认和重视,这是使人十分高兴的事。

在诸多书评学理论中,徐柏容先生的《书评学》是最新的、最系统的一种。他多年致力于书评研究,《书评学》的问世,是他多年辛勤耕耘的果实。徐先生是一位很有学问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出版家、编辑家,也是学者。他有许多著作,《书评学》仅是他成就中的一部分。这部《书评学》很有自己的特色,它一方面总结了社会上多年来开展书评活动的经验,将这些经验系统化、理论化,使经验得到了升华;另一方面,徐先生从自己多年编辑生涯的体会中,总结出了书评的规律,如书评学的概念、书评的意义、书评的态度、书评的目的和要求、书评的对象、书评的写作方法等等,提出一整套系统的独特的见解。书评有共性也有个性,不能千篇一律,百词一面。他讲了共性,也见别人之未见,说他人之不说,自成一家。他山之玉,本土之珠,融成了独具特色的《书评学》,这是百花园中的一朵新花,是书评理论阵地上的一朵绚

烂的新花。

书评事业还要发展,书评理论更待繁荣。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书评理论的兴旺,才能促进书评事业的蓬勃发展。《书评学》的问世,对书评事业,对书评理论都将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书评是一项重要的事业,也是一项艰难的事业,书评往往是劳而无功,费力不讨好,因此,热衷者不多。书评理论则更是问津者寥寥。徐先生不顾这些,独坐幽篁,躬耕南阳,不媚俗,不奢求,以事业为重,不能不使人感佩。愿这样的人更多些,愿书评理论更昌盛些。

1993 年 4 月

书评琐语(上)

我和徐柏容、吴道弘先生共同选编了一本《中国书评精选评析》，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选了20年代到90年代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各类书评文章。编选目的是想对书评事业有所回顾，有所提倡，有所推动。在选编时对每篇文章都从书评的角度出发，讲了一些我们的看法，少则几十字，多则数百言，多是论及一点不及其余，并非全面论述每篇文章的成就，论及不周，尚请作者见谅。这里我只选了我评析的文章的按语。书前我写了个序言。这些按语似的评析，反映了我对书评文章的一些看法，所以，冠其名曰《书评琐语》。

评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1918年8月3日)

序言是书评的一种。序可以评书，也可以评作者，也可以离开书和人泛泛议论，自由度很大。本序的特点是，就书而评，是一篇肯定性的书评。

蔡元培为什么评这本书？胡适后来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说：在他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每个讲中国哲学史的都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他还特别提出，‘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说是‘截断众流’的手段。其实他老人家是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辩护这一点”。蔡元培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写这篇书评是为了辩护，可见现实性、针对

性是很强的。

这篇书评首先点破编写中国哲学史的难度,材料难选,式样难定。因此,他主张借用编西洋哲学史的经验。这在当时,思想是比较新颖的。蔡元培肯定作者的开创性劳动,一年就编成了,“可算是心灵手敏”。从讲难到快速编成,以引起读者注意,这是先声夺人评论法。

蔡元培熟读全书之后,对全书内容进行梳理,并不详细介绍分析全书内容,而是既跳出全书,又综合全书,总结出全书的四大特色,这就要有相当的眼力和水平。引文简洁,眉目清楚,语言流畅,是一篇难得的早期书评佳作。

评秦牧《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重读陶铸同志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原载 1979 年 2 月 3 日《人民日报》)

秦牧是有名的作家,尤其长于散文。这篇书评虽题目和内容都有极强的政治性,但文笔很好,带有浓厚的散文气息。用散文的笔调写书评,不仅容易出文采,还会感情浓烈。这种书评,读者爱读。

1979 年初,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尚未得到彻底平反。《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列为毒草,造成冤案。这篇书评起到了平反的作用。因此,也可叫做平反书评。

文章的起点、落点都在书,中间却是议人,用很大的篇幅回忆陶铸的为人、品格、工作作风、道德文章、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讲他为什么写这本书,进而评价这本书的内容、风格,提倡青年应该读这本书。议人议书有机结合,融为一体,极富文采,极富感情。结尾是“我写下这些,既表达自己对这位前辈革命家的怀念和哀思,也向广大青年读者推荐这本书,这是陶铸同志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和标题遥相呼应,起了点题之妙。这里面,也显示了作者松树般的风格,道出了本文的主旨。

评吕叔湘《〈语言与社会生活〉读后》(原载《读书》1980 年第 4 期)

读后感式的书评有多种写法。一般是针对原书发表感想;也有以

讲思想为主,同时连带原书议论的;还有因原书引发,想起许多相关的问题,展开议论。本篇是后者。吕叔湘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是“读了陈原同志的《语言与社会生活》……想说点自己的感情”。他没有评论原书,重在讲自己的感想。作者针对人们只将语言当作工具,而讲了什么是语言,“说话是一种社会活动,语言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是复杂的,因而语言也就不可能不是复杂的”,“语言不是一种简单的事物”。讲语言要和人、社会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深了一层。

对语言学的发展,归纳为几次解放:由摆脱狭隘的实用目的到寻求语言发展的规律,这是一次解放;20世纪提倡为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这是语言学的第二次解放;到50年代,学者们把语言当成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这样提出问题,既看到了语言学的发展脉络,也使人对语言学的认识更清楚。此外,作者还讲了一些趣味性很强的语言方面的知识,也对人有所启迪。

评张炯《1980年长篇小说一瞥》(原载1981年6月9日《光明日报》)

这是一篇对1980年出版的90余部长篇小说全景式的综合评论。综合评论是很难写的,要看大量作品,要善于比较、提炼、概括,既要选准切口,又要评得准确,还要有全景式的综述。张炯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有相当的研究能力和评议水平,这篇评论比较确切地概括了1980年长篇小说的状况和它们的特色。

评议中点了61部作品,是全年作品的2/3,面比较宽,可见作者的视野也是比较宽的。作者抓住历史这条主线,选准三部影响较大的作品切入,然后将作品分时期入座,以观点带作品,以作品论证观点,对重点作者、作品做画龙点睛之议。有面有点,有述有评。另外,对少数民族题材、海外华人的作品,也做了简短的评析。最后归纳出不足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虽然谈得比较委婉,却也切中要害。

全文用笔比较简练,脉络、层次清楚,对作品的特色和不足言之成

理,不失为一篇较好的综合评论。

评朱正《伟大人物的一个侧影——读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原载《文学评论》1982 第 4 期)《一个令人遗憾的选本》

朱正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做学问很认真。从评这两本书的用笔,就可看出他的良好学风。

《伟大人物的一个侧影》是评《〈两地书〉研究》的。朱正研究过《两地书》,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评论别人的成果时,不是贬低,而是和自己的研究对比,扬人之长,十分难得。他认为第一部(甲编)“不似我做的校记那么烦琐,更适于阅读”,“给人们提供了第一手研究资料”。对鲁迅的婚恋生活,朱正说:“我自己在《鲁迅传略》1956 年的初版本中,虽然出现了许广平这个人物,但并无一字介绍他恋爱婚姻的情况。至于与朱安的婚姻,乃至朱安其人,更简直是一字不提”,《〈两地书〉研究》做了详细介绍评议,特别是对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写了整整一章,写得“深刻”,“比较公平”。对鲁迅和许广平定情的日子,他曾说是在“1925 年 7 月 30 日后的某一天”,但《〈两地书〉研究》说是 1925 年的端午节,即 6 月 25 日。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他仍然赞扬“作者这种思考是这样细致”。

朱正在和自己的研究比较之后,充分肯定《〈两地书〉研究》“多数论说,大抵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是“从材料中引出自己的结论”,“这本书的价值,就是作者敢于把自己见到的真实说出来”,“为他日系统深入研究鲁迅思想做了一项重要的坚实的准备”。朱正的评论是公允的。

另一篇文章《一个令人遗憾的选本》,是一篇“揭短”的书评。目前的行情是书评市场很少批评文章,人们不愿“揭短”,怕得罪人,这篇书评就尤为显得可贵。他认真地“揭”了选目和注释之“短”,“揭”得有根据,被“揭”者不得不口服心服。这个“短”“揭”得好,所以特别选入了这篇。

评叶至善《读了〈倒影集〉》《生动有趣 发人思考——我看〈智力测验大全〉》

叶至善是儿童教育家、儿童作家,一生从事少儿出版工作,虽已年近八旬,但仍童心不泯。他的这两篇书评,都别具一格,十分生动活泼,韵味十足,趣味无穷,具有童性。特别是《生动有趣 发人思考》一文,是评《智力测验大全》的。全文除了前面一段是对“大全”的概括,说“大全”最突出的优点是“题目多”、“方面广”之外,其他主要内容都是以童心的思考来评论《大全》。引用事实,说明问题,解答问题,促使人思考问题,都带童心童性。以此来证明“大全”的可读性、科学性,适合儿童阅读,对儿童有益。有些题目好像是“蒙人”的。叶老举例说“蒙”得好,“蒙”得有趣,“对这类‘蒙’的题目有点儿偏爱,自己愿意被‘蒙’”。这不是评得妙趣横生吗?

《读了〈倒影集〉》也写得特别,叶老用回信的形式,回答作者的致读者的序言,说明自己对《倒影集》的看法和读得“有滋有味”的原因。他一个一个故事分析,既介绍故事的内容,也提炼出故事对人的启迪和它们的现实意义。叶老不是空泛地议论,而是让事实讲话,就事论事地进行提炼,可谓恰到好处。

读叶老的这两篇书评,感到轻松有趣,是一种享受。

评胡绳《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原载 1983 年 2 月 11 日《人民日报》)

《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是一篇评领袖著作的书评,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本文的特色是在体会《文集》的精神中结合实际,作画龙点睛的议评。作者抓住《文集》中的《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几篇重要文章中提出的农村革命的几个主要问题发表议论,书评不仅使读者清晰地认识了 30 年代农村的面貌,还理解到今天重读《文集》的必要:“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看……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对“认识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都很有意义。作者还提醒人们,“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是在调查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对于现在

做社会调查的同志来说,这本调查文集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可供借鉴的”。这样,就使在新时期读《文集》有了新的内涵。

评析廖盖隆《评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原载《读书》1979年第5期)

《评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是一篇以介绍原书内容为主的书评。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1937年到达延安,1941年回到美国。她用几年时间,采访了朱德同志,回国后仍然从报章、广播中了解朱德的情况,以朱德从出生到1946年12月1日止60岁的生平,写成《伟大的道路》一书。

本篇评论着重介绍了《伟大的道路》的重要内容,介绍时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抽出主要情节,从而再现了朱德的伟大品格,一生中追求真理,为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崇高精神和他战斗的一生,为新中国立下的不朽功勋。书评虽然较长,却读来有味,如见朱德其人,很亲切。

作者主要是让事实说话,只用了简要笔墨评论全书:是“记述朱德同志的生平和时代的好书”。“这本书的特色,就在于它是通过形象手段来刻画人的内心世界、人的典型性格的。……不仅刻画出了朱德同志这样一个出身贫苦农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形象,而且刻画出了许多其他老一辈中国革命家和革命老战士的生动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朱德同志经历的那些革命年代”,“不愧为世界上形象地叙述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著作”,着墨不多却讲出了全书的特色和价值。

作者还简要地介绍了史沫特莱。她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刻来到延安,宣传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领袖,对中国人民情有独钟,读后使人对她产生无限崇敬之情。

评析丁玲《我读〈东方〉——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原载《文艺报》1979年第7期)《我读〈高山下的花环〉》(原载《红旗》1983年第3期)

丁玲的这两篇书评,一篇写于1979年(《我读〈东方〉》);一篇写于

1983年(《我读〈高山下的花环〉》)。

《我读〈东方〉》用同一位青年写信的口吻,谈对《东方》的看法。作者研究了《东方》的创作过程和道路,充分肯定《东方》的成就,深入分析小说写得好的原因是作者有40年的生活积累,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写的是他所熟悉的人和事,而这又是一个作家创作佳品不可缺少的基础和条件。评论与用笔比较随便,写得比较亲切,富于感情。

《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影响极大的作品,作者只用了千把字做了简洁的评论,可谓短中见大。既肯定它“写得美”,不仅揭露了不正之风,还赞美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又指出其美中不足,“没有把该写的地方写出来,没有写够”,雷军长、梁大娘,都没有写够。

作者采用对比评论的手法,将《高山下的花环》与《春天的童话》对比,评出谁美,谁不美。作者对《春天的童话》的倾向和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不赞成的。

评析李侃《读〈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

李侃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评论,是对原书提炼概括性的书评。《史论》是10篇独立成章的论文,经过李侃的评论,将《史论》中说的三大思潮概括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发展的趋向,也是历史的主流、思想的主流,这就将10篇散论归纳成为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专著了,这种归纳既符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实际,也反映了作者的见解和水平。

《史论》把三大思潮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说成是第一思潮的开始;第二思潮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的改良派,是变法维新思潮;第三大思潮是革命民主思潮。李侃评论中认为分析得当,并对三大思潮进行了扼要的评析,特别点出对改良派的分析,不是简单地将之列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而是从实际出发,比较科学,有异于一般史论的看法,这比较精辟,评出了原书的特色。

李侃在评论中抓住了《史论》的核心问题,抒发自己的看法,实际是对原书进行概括和提炼。这充分体现了学者写学术书评的特色。

评析李一氓《读〈中国历史地图集〉》(原载《读书》1984年第12期)

《读〈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篇科学性、批驳性、政治性很强的书评。作者主旨不在评书,而在批驳因出版该书而引起的国内外的错误思想和谬论。一是国外的“领土野心论”,一是国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外敌”论。作者指出,我国的版图每个历史时期曾经多大就画多大,现在实际多大就画多大;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过去的争斗、胜负已为历史陈迹,和今天的政治现实没有直接关联。我们必须忠于科学,忠于历史;我们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有学术责任弄清已为历史事态所固定下来的地理实际,也有学术责任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的领土完整。通过评论,澄清了是非,充分体现了评论的战斗性。

评析罗竹风《读〈编辑忆旧〉所想到的》(原载《读书》1985年第7期)《大胆的突破,杂文的丰碑——为〈中国杂文鉴赏辞典〉说几句话》

评《编辑忆旧》的文章,选了两篇,一篇是罗竹风的,一篇是丁景唐的。同评一本书,角度不同,书评内容也各异,在比较中可以看出书评的不同风格。可见书评的写法也可各种各样。

《读〈编辑忆旧〉所想到的》,不像丁文突出赵家璧个人的敬业精神,而是在宏观中突出两点:一是赵家璧主持的良友图书公司在中国出版史、文化史上的作用和贡献;二是从《编辑忆旧》提供给我们今天的思考,所评意在书外。

良友图书公司的历史作用在哪里?它从中间态度逐渐转变,联系广大左翼作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为开拓中国新文学道路披荆斩棘,卓有成效。通过赵家璧个人的编辑实践,纵横交错地展示了当时的一幅新旧斗争的画面和进步出版事业的概貌。赵家璧主持良友图书公司,实在功不可没。

书评的后半部分,从“忆旧”中引发出对今天编辑事业的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评论总结了三点:一是编辑工作是创造性劳动,